



文化视域中的 美学与文艺学

Aesth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Culture Horizon

毛崇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化视域中的 美学与文艺学

Aesth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Culture Horizon

毛崇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域中的美学与文艺学 / 毛崇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4543 - 4

I. ①文… II. ①毛… III. ①美学 - 文集 ②文艺学 - 文集
IV. ①B83 - 53 ②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376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文化视域中的美学与文艺学

著 者 / 毛崇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微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师晶晶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543 - 4

定 价 / 98.00 元

印 张 / 28.25

字 数 / 500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美学与文艺学共同以艺术为主要对象，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审美关系的研究决定了两者的亲缘关系。美学被黑格尔称为“艺术哲学”，意味着它要求更高的抽象。美学直接面对自然美本质论的思考不同于自然在文艺学中仅仅以文本化出现，所以乃有“文艺美学”提出。后起之生态美学以整体自然界为对象。环境美学也与文本化的艺术作品拉开了距离。在一些应用领域，如技术美学、旅游美学，不仅淡化了形而上学，也与文艺学的关系疏远了。一般意义上的美学仍然与文艺学保持着传统关系。本书即以作为元理论之美学问题为主要方向，对其学科性与科学性加以特别关注。所谓“元理论”也就是有关美学对象在真善美以及审美与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界限之内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如美、审美与美学学科发生论，以及随同美学的发生展开的边界。现代分析哲学不把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因为它没有实证主义规定的科学性，作为美学的对象“美”究竟“是什么”成了伪问题，对于文艺学也是同样。近年来，在美国哲学讲坛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一方面向实用主义靠拢，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又发生语言学转向，这两方面都处于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呈现出在多元化状况下的思潮融合趋势，有关问题笔者在《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一书中有所论涉。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必囿于某些学派之见，而它们提供的知识资源不容忽视。

文艺学包含着双重意思：一是作为对艺术的文学（art literature）的简称，作为专门的人文学科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包括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批评与赏析及以此为对象之文学理论的研究。无论中外，文学还有艺术之外的广泛含义，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广义文学的含义。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所指的文学也跨越审美艺术界限被作为广义理解。艺术文学的审美特性也被称为 fine literature，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这个词被译为“美术文章”，很是别扭，也不确切。文艺学的第二层意思是，以艺术文学与文学以外的其他所有的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书兼取二者综合意义，既以艺术文学为主要对象，也广泛涉及其他类型的艺术。

立足于美学与文艺学这种亲密而有间的关系，将之置于作为“后学科”的文化视域中，研究有关它们的学科性与科学性问题。这个思路经过

了一个连贯的发展阶段，在新旧世纪交替以来的文化研究热中，以及在真理与价值、知识与智慧分裂的背景下，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合法性的质问使美学与文艺学面临学科性危机，因而如何重建它们在文化研究作为“后学科”中的学科合法性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笔者在2002年的《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及2009年的《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中均有所涉及，如真善美与价值以及“科学美”等问题。后一本书中的“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一节挪于本书更为合适（该书若有机会再版当将其删之）。学科性重建必须以其科学性为基础，“美学文艺学的学科性与科学性”2010年作为课题正式启动。

文化作为“视域”或“视界”仍然有个边界问题，“视野”虽不是无边无垠，但其界限也不那么确定。而文化虽有阈限，毕竟也比专门学科广阔。在学科边界上“划”而不“死”，“解”而不“消”，“游”而知“返”，“统”而有“分”，本着这样一种理念，本书仍从后现代思潮中学界现存的诸多问题着手，贯以批判精神。第一部分“总论”主要内容与文化研究相关，以将美学文艺学学科性与科学性置于这样的前沿语境之下。本体论与本质论、认识论与实践论，既是美学也是文艺学诸多观念发展更新共同哲学基础，也是不同学派论争的焦点。本书所论“文学的结构性多重本质”问题作为笼而统之的命题不是什么新东西，文学观念更新以来已有众议，由于各家在以上哲学基础及方法上的差异，同一命题下“见智见仁”。第二部分“美学文艺学重建的哲学基础”对其他各篇有立场与方法上的贯穿。这种贯穿到最后的“文化篇”成为一种文化的历史哲学与开篇“总论”相呼应。通过“后现代之死”热门话题引出从“回到亚里士多德”“回到康德”直到“回到黑格尔”与“回到马克思”。这样一个历史理性批判的逻辑与历史发展本身有着整合性关系，显示出历史在线性上的连续与非连续之张力关系，其终极目标指向“晚期资本主义在哪里终结”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涉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关系到当前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未来的历史使命。美学文艺学与文化理论及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同属“为人的解放”主题，以这样的文化视域来展开学科性与科学性研究似乎没有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很远。

附于文化篇之后部分是对约半个世纪以来十多部有一定代表性的艺术电影的观感、评论与研究，可以说是美学文艺学在一些实例上的展开，从中约略显出艺术思潮的流变，由于深浅有所差异，故未纳入正篇。

本课题的一些阶段性成果于这几年陆续发表，无论它们是多么不成熟，许多学刊还是慷慨接纳，给予听取各方面很中肯的意见、不断改进的机会。

本书的某些章目，如“艺术终结”“艺术的审美与反审美”既属于美学也属于文艺学，可在文艺学篇与美学篇之间互置，彰显两门学科互跨关系，这也是同行提出的有益建议。2009~2010年连续申报此项目未准也是一种鞭策，敦促我对有关问题如何尽可能考虑得更加严密、周全、深化并推出新意，次年完成其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后期资助，于此致谢，同时在这里对诸多同人与有关刊物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并表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本书涉猎问题之驳杂，必多有舛误、疏漏之处，还望宽容的读者不吝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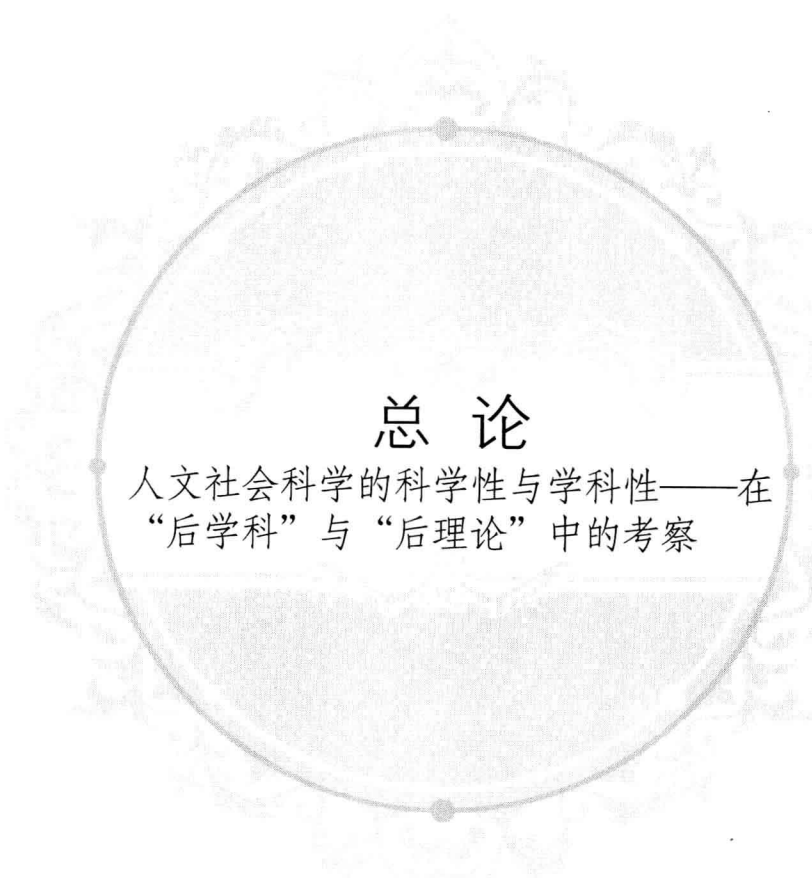
2012年隆冬



总 论	1
一 后学科与后理论状况	3
二 人文与科学/学科与学科性	7
三 科学性、学科性与文化研究	16
四 社会分工与学科分界	27
五 马克思与文艺学学科性	30
哲学篇	37
一 美学文艺学重建的哲学基础	39
二 我国哲学界有关的几场论战	46
三 新世纪的再交锋 ——“重新理解”还是“随意阐释”？	50
四 我国美学界的介入	57
五 自然与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60
六 文学与哲学解释学	63
七 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与普世价值	79
美学篇	93
一 美、审美与美学的发生 ——从哲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方面考察	95
二 美学，应对复兴与学科性危机	125

三 美学“学科新形式的探讨” ——韦尔施的美学悖论及思想进路	144
四 “内美”不是美 ——对“社会美”问题的重新思考	161
五 美学与文艺学之本体论与本质论	175
六 蔡仪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贡献	205
文艺学篇	229
一 文艺学学科合法性问题	231
二 本体论上的艺术生产/消费/价值	243
三 文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264
四 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278
五 “思无邪”:文学对真理的审美关系	297
六 艺术终结——艺术与科技进步	310
七 艺术的审美本性与去审美化问题	328
文化篇	347
一 后现代果真死了吗? ——“终结”与“回到”间的逻辑与历史的张力	349
二 回到亚里士多德 ——以善为历史目的之实践	354
三 回到康德 ——向着世界联盟的世界公民	359
四 “回到黑格尔”与“回到马克思” ——历史总体与意识形态幻象	364
五 “回到马克思”之东方话语 ——柄谷行人与可能的共产主义	369
六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与世界命运 ——晚期资本主义在哪里终结?	373
附:艺术电影的文化政治学与诗学阐释	379
《暴君焚城记》与信仰自由	382
《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与电影的史诗品格	385
法西斯亡灵的招魂曲——日本电影《吾为君亡》	389

电影《女王》是保守主义的吗?	393
小人物们的正义之歌——俄罗斯影片《十二怒汉》	395
电影中的冷战——《同伙》	398
“无乐不作”与“娱乐致死”	
——《海角七号》与《非诚勿扰》比较	400
太虚幻境与梦工厂中的性幻想	
——从《红楼梦》到新浪潮与“后女性”电影	402
超越“乡愁”的《乡愁》	
——解读塔可夫斯基的影片	412
索 引	420
主要参考文献	432
小 跋	439



总 论

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性与学科性——在
“后学科”与“后理论”中的考察

一 后学科与后理论状况

在人类文化生活与精神现象中哪些知识属于科学？人文学科（humanities）与科学的界限在哪里？学科边界又是怎样形成的，是否合理？这样一些科学知识边界的限定与思想超越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于历史不同时期在不同高度被反复提出，表现为不同时代精神对思想解放与知识更新之诉求和召唤。

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命名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仅限于文艺，是以艺术为主要形式包含着对古代希腊崇尚知识和真理的广泛人文精神之重建。经过一个多世纪针对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批判的启蒙运动思想准备后，17世纪笛卡儿把这种精神概括为“我思故我在”，标志着思考对知识永无终止追求的生存意义，这一命题被培根拓展为“知识就是力量”。以人类理性为轴心，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代表着三百多年来整个时代的精神特点。之后约一个多世纪，在欧洲狂飙突进时期，康德以《纯粹理性批判》等三大批判提出了人类认知的界限以及作为最高普遍价值体系真善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跨越了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人类进入20世纪，以上一系列有关知识的问题在新的语境下以新的方式重新提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冷战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波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此同时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人类从蒸汽动力与电力机械时代进入电子信息技术时代，与新的生产力相伴之“信息爆炸”与“资源共享”对传统知识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后冷战时期世界新格局与信息时代面临着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许许多多有待解决的新课题。如果在知识的问题上前一个世代可以概括为存在与认知、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谬误等，这些二元关系则始终围绕着科学知识作为主体力量在对象世界关系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个核心问题，在我们的时代问题则集中于科学性与学科性质疑。诚然，这种质疑是在现代主义思潮对工具理性持续地批判，进而信息产业对知识经济、知识资本与文化消费的启动语境下发生的。

康德把启蒙概括为人们对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①同时对人类认知的界限进行了反思。卡尔·波普尔把“极权主义及传统主

^① 康德：《什么是启蒙》，《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

义”与“反极权主义及反传统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在真理与虚妄的路上，把科学的增长方式概括为“猜想与反驳”。^①其间跨越了两个多世纪，对知识与科学的哲学思考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这种提问方式之当下语境虽迥然相异于启蒙运动与笛卡儿—培根—康德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而科恩仍将之归为从哥白尼到康德的“科学革命”，当然他主要不是从纵向发展渐进的历史特点强调科学革命，而更注重所谓“范式”之横向关系，在发展观上有突进的替代特点。^②

综观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学科性质疑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人文学科科学性的质疑，导致其去科学化，将之排除于社会科学之外；二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学科性的质疑，导致文化研究之“后学科”状态。由此带来人文领域的种种相关理论与话语，比较集中于科学哲学与文化理论之中，这种语境的根本思想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义对主客二元关系的取消及对本质主义的挑战，进而在主体方面否定了主体的认知性功能，在客体方面否定了真理具有不以主体转移的内容。这个新的知识轮回似乎把人们带到了一个新的有待摆脱思想“不成熟”的状态，因而带来种种人文危机，如知识合法性危机、学科合法性危机等。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研究将其总体性危机分为经济上的系统性危机、政治上合理性危机导致认同上合法性危机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他指出：“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而这种动机危机被解释为：“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新要求’）”。^③这个社会文化系统危机在科学性与学科性上的体现到了20世纪后半期至新世纪初已渐渐明朗，在文化理论中展开的状况可简要地综合概括为“后学科”与“后理论”。

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在《反思科学》一书中用“不确定的时代”来概括当前世界，他们指出，这个时代“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空间，与社群、文化以及（更富争议的）经济等‘其他’诸领域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相反。所有这些领域，它们‘内在的’异质性日益明显，‘外在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甚至互相渗透。因此，它们之间不再界限清晰分明，难以区分。……就科学的社会构成来讲，异质性与相互依存性始终都是科学的特征，而它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独立性，也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

①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② 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③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52～57页。

定性”^①。

在科学知识持续渐进带来跳跃式的更新发展中，作为认知主体自由思想的花朵，无论整体、群体、个体，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中心化的学科性的边缘地带不断被发现存在一个非学科性的“他者”，这种对“我思”的限制感甚至随着科学发展愈益加深。科学与人文、非科学、前科学以及学科化与非学科化，这些由各种界限限定之际间关系的对峙伴随着不断的“思想革命”“知识革命”及“文化革命”，20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大体面对着此类问题。

1990年召开了一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国际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弗·杰姆逊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对42位作者的会议论文作了综述，就文化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入的概括与分析。他指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②。用“后学科”来概括文化研究突出了其后现代对现代性反思与改写的“不确定时代”之特点，彰显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学科性的挑战与颠覆姿态。

对于文化研究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对一些学科不满？这些“学科的内容”哪些方面引起不满？它们表现出怎样的局限性？这样的提问不在于“要不要文化研究”而在于“要不要对文化研究进行研究”。杰姆逊的《论“文化研究”》这篇文章对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本身就属于对“文化研究”的研究。

“后学科”是后现代时期的独特学术现象。波林·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专门研究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把“大学背景下学科间按常规所作的严格划界和分类简单地视作现代性的残余”。正是这种理念，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决定着其对大学学科建制的“不满”以及文化研究作为后学科的兴起，进而带来“后理论”状况。

“后现代”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用语的话，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既代表着工业文明中的某些新因素也相应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化现象。“后现代性”为这一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特点的总括。后现

① 海尔格·诺沃特尼等：《反思科学——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冷民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1页。

② 弗·杰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00页。

代主义是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广泛的社会思想潮流，罗斯诺指出，这一思潮“重新安排了整个社会科学事业”，以至“后现代主义”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本身的代名词”。^①即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一个等号，也可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的一种重要显示。文化研究在后现代作为“后学科”之所以把传统的学科性看作“现代性的残余”，其“不满”也正在于此。如有人认为：“传统学科划分准则是在国家权力主导下确立的对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②无须赘言，此类结论肯定也是出自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文化研究本身与对文化研究的研究有着区别，同样，后现代主义本身与对它的研究也需分清，正如杰姆逊的文章作为对文化研究的研究，罗斯诺的著作则为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

作为“后学科”的文化研究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越过其顶峰后，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提出了“文化研究是否想要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促使我们从人文学科性之知识与政治的关系来反思其“后学科”状况，并循此探寻相关的“后理论”的出路问题。

特里·伊格尔顿正如他在20世纪后期写的《后现代主义幻象》等论著作为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一样，2003年推出的《理论之后》一书可以说也代表着对“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该书历数20世纪影响一个时代的诸多思想理论大师，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一个个去世的情形，并提出有关“后现代思维方式很有可能正在走向终点”的问题，这就是“后理论”的基本状况。“理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结束，不是人们不再需要理论了，作者指出：“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这是一种理论大师“断代绝后”的情况下，时代向理论提出的课题。“后理论”与“后学科”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正是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新的质疑”提出的，“它需要冒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学科”是后现代主义以文化研究出现的理论“冒险”，以“使人从感到窒息的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一直不愿触碰的话题”^③。

① 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第7、9、15页。

②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编译，三联书店，1999，第3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13~214页。

如果说“后学科”是指文化研究本身，“后理论”则包含着对文化研究之研究，两者虽同归属于广义文化理论，但应注意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异。“后学科”与“后理论”这样一种语境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学科性问题颠覆与重建的背景状况下提出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些关于知识的报告纷纷出台，如1969年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后结构主义者利奥塔1979年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年鉴派历史学家伊·沃勒斯坦领导的9位知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者组成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于1994~1995年提出的《开放社会科学》的报告等。以上几个贯穿着这一时期的知识报告与有关的社会思潮的起伏相呼应，代表着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人文社会科学思考的三个阶段：（1）问题与危机的发现与提出阶段；（2）传统知识法规的颠覆阶段；（3）从知识与科学学科性颠覆到重建的转折阶段。其中贯穿的线索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中的知识性、科学性与学科性的各种复杂的界限问题。

福柯以“话语实践”与“知识考古学”所提出的主要是知识的前科学问题以及科学历史断裂问题，他同时也相应提出了学科性作为戒规与惩罚的问题。《开放社会科学》报告侧重于学科间边界提出的学科性问题，所谓学科边界问题包含着学科间界限确立的合法性。学科性“危机”也就是对这些领域各种制度、法则、戒规合法性的追问与挑战，利奥塔提出了这个问题。由危机和挑战带来重建的机遇，其中必然包含着重新立法与划定边界的机理。“开放社会科学”之命题意在把边界打开利于重建。而重建不意味着无法则、无边界的知识和学科之再构。边界问题始终在消失、转移中处于知识与学科重建之轴心。这些问题的挑战性使之带有冒险意味，集中于后理论形态之文化理论而表达出来，形成一种“后学科”态势。在一系列后现代主义理论冒险上，最具有持久影响力也是最后一位谢世者德里达提出了“去中心化”的解构方法，他的“在场形而上学动摇”与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及福柯的知识的历史连续性断裂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及不同表达方式。对这些报告本书下面还要结合一些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

二 人文与科学/学科与学科性

科学是人类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把客观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以各种